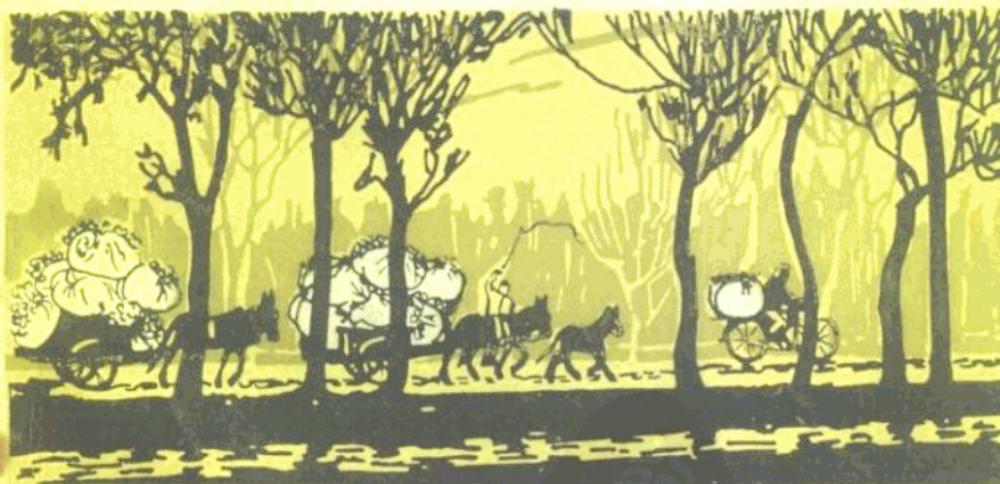


15-15

高唐文史資料

第八



政协高唐县文史委员会

目 录

棉花史话	吴宪明	(1)
赵庄花姑庙的传说	杨胥先	(28)
从利民货栈到棉豆动力加工厂	王 琴	(31)
“双粮案”始末		
——纪李济亭等为民释重赋	吴宪明	(36)
蓄灌排涝 造福人民		
——介绍梁村镇董姑桥大闸	赵维平	(40)
1953年涝灾记实	杨金龙	(43)
治水人物	高唐县水利志办公室	(46)
国际学联参观高唐的经过	王 琴	(52)
北洋军第七旅在高唐	尹培岭	(55)
记姜庄“8·27”惨案	储文东	(59)
茄子王惨案	于海舰	(63)
日伪时期一学校	杨子生	(65)
记高唐女子师范部	吴宪明	(68)
高唐县侨置情况概述	何庆臣 苗长志	(72)
高唐县故城考	何庆臣	(76)
从鱼邱古驿说开去	李和貴 尹培岭	(79)
皇殿村名的来历	曹同云	(87)
宋塔与唐槐	任之文	(89)
皇帝御匾	张艺民 白树峰	(91)
两位有功于台湾的高唐人	县志办	(92)

- 状元阁咏 杨胥光(94)
忆李苦禅先生 李 洋(96)
李苦禅故事二则 张艺民 搜集整理(101)
“大洋人”轶事 张道珍(107)
高唐第一位女大学生 尹培岭(110)
烽火八年间 阎长庆口述 张金洪整理(115)
难忘的回忆 郭茂荣(125)
只身除匪首 张长维 赵维平(131)
姜克夫同志生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33)
漫话货币 高唐县金融志编写组(140)

棉 花 史 话

吴 宪 明

棉花，原为热带植物，大约在三千五百多年前，印度已成为棉业中心。棉之初生，系木本，多年生植物，无须年年种植，故称“木棉”。后来，劳动人民开发棉业，将木棉移植于温带，木棉到了冬季便枯死，旋以人工栽培之，木棉遂由木本演化成春种秋死的草本植物，称“草棉”，即棉花。

中国始习种棉，约在印度、婆利国的棉布输入中国之后。唐玄宗时（公元712年—756年）长安（今西安市）即有卖白叠布者。唐后期，我国岭南地区（今两广一带）出现了白叠布家家织的情况。唐文宗（公元826年—840年）及朝臣对广西的“桂管布”皆很喜用。北宋时期（公元960年—1127年），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已渐盛行。南宋时期（公元1127年—1368年）传至长江、淮河流域，棉布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穿用的主要衣物。这时，统治我国北方的金朝，曾向南宋输出纺织品。公元1211年，山东农民起义，以着红袄为标志。据《聊城地区棉花志》记载，公元十二世纪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已从我国南方、新疆、河西走廊等地引种了“亚洲棉”和“非洲棉”。地处鲁西北的高唐县，在汉、晋至清末（公元前206年—公元1911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之前，一直处在南北交通要冲位置，为历代行政、军事

之要地，获信息灵便之利，因而较早地引种了棉花，算来应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

棉花在高唐大地上安家落户，久居不离，除了社会原因、人为因素之外，最根本的条件是高唐的自然环境和小气候适合于棉花生长的需要。第一，高唐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区，其土壤多为轻壤，耕层质地良好，最适于种植棉花，全县宜棉土地达六十多万亩；第二，高唐县在棉花生育期的日照时数为1804小时，全年平均积温 4341.7°C ，适应棉花对光照和温度的需求；第三，高唐县在棉花生育期的降水量一般为五百毫米左右，基本能保证棉花对水份的需求；第四，高唐县的水土中含有多种利棉元素，不但有利于棉花生长，而且所产之棉内在质量好，历来深受纺织界的欢迎。相传，清代时，高唐州给朝廷送贡棉，在卫运河曾发生一起翻船事故，船载之棉倾入河中，棉绒被河水久浸不湿，好象水鸟的羽毛一样具有良好的脱水性能。因此，高唐植棉条件得天独厚。棉花在高唐遇到了风水宝地，深深地扎了根。

元、明、清三代，高唐棉花生产规模由小到大，棉花产量由少到多，一代比一代兴盛。

元代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高唐县升县为州，属元朝“腹里”九十一州之一。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1294年）强调恢复和发展全国的农业生产，设立了劝农司、司农司，巡视各地农业生产情况。公元1273年，元政府编纂了《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执行。公元1289年，元政府在我国南方设立木棉提举司，年征木棉十万匹。元成宗时，定江南地区麦税折征木棉，推动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和棉纺织业的兴起。全国著名纺织能手黄道婆（松江乌泥泾镇人、今上

（海市闵行区）从海南岛学会了纺织技术，约于元成宗初年（公元1295年）返回家乡，对当地群众教以“捍、绩、纺、织之具，错纱、配色、综线、洁花之法，织成被褥带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等字样，乘然若写，人们受启，竞相作为。”相传，在这一时期，一位“花姑神”从南方来到高唐，传授植棉技术，教人纺纱织布，人们受益匪浅，把她奉若神明。她死后，群众为她建庙立祠，每年正月二十八日（花姑的生日）这天，四面八方的棉农来到花姑庙大进香火，纪念这位花神，祈求花神保佑棉花丰收。高唐棉农谚曰：“收花不收花，看看正月二十八。”如果这天天气主晴，即预示当年棉花丰收。这座花姑庙始建于城东祁寨村，公元1431年，重建花姑庙碑，于城西门外南侧。后来，城西赵庄等地也兴建了花姑庙，花姑庙佳话传遍乡间，群众将面条示棉花枝，将面片做成棉叶形，把饺子包成棉花萼形，供奉花神，寄托对花神的敬仰，向往棉花生产的发展。

元代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各族群众在生活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以棉花为原料的衣服比丝麻衣服温暖，比毛皮料衣服轻便，而且棉花能够大量种植，获取比较容易，加工制作比较方便。因此，棉花受到广泛的喜爱。元政府顺应民意，于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向全国下达植棉令，要求“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元文宗、顺至年间（公元1328年——1333年），高唐州自然灾害严重，“虫食桑叶为枯株”，桑农受到了巨大经济损失，忿而弃桑种棉，棉花生产有了新的发展。

明初之前，我国北方和中原地区的经济屡遭战争破坏，

千里沃野尽为莽(zhen)莽之地，人民得不到生息繁衍，人口锐减，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时，高唐州的人口只有八千二百三十人。向明政府交纳的棉花绒数量只有九十七斤十四两。明太祖审时度势，明确规定：“无主荒地可听民垦，以为永业。”他还下令山东等地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起，“新开荒地永不起科”，“多种棉花可蠲(juan)免赋税或永不起科。”皇令如山倒。高唐州群众再逢发展棉花生产的机遇，重操旧业，促进了棉业复苏。同时明政府屡屡徙山西民户至苏、鲁、豫、皖各省，以填充人烟稀少地区。从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四年(公元1416年)共移民十三次。本县居民除土著者外，部分来自山东的登州、莱州和青州，大部分来自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及潞、泽、辽、沁、汾诸州，逐渐形成一批高唐州以“××屯”命名的村落，棉花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山东著名的产棉区之一。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高唐州向明政府交纳的棉花绒达到二千七百八十九斤。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东昌府的棉花产量跃居山东六府之首，本州棉产量居东昌府各州县之首。明万历东昌府志曰：“东昌府高(唐)、恩(县)两州县土宜植棉，江淮贾客贸易，居人以此致富。”明末学者顾炎武说：“高唐、夏津、恩县植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贾(lai)收，居人以此致富。”社会上传诵着“产棉之区高恩夏武(城)”和“金高唐银夏津，铁打的恩城”佳话。随着棉花产量的日益增多，明政府对棉绒的需求得到满足，遂将年征收棉花绒的数额，由一千五百万匹至两千万匹，逐步减少，降至每年只征收一百七十多万匹棉花绒，其余征收部分改为折征银两。因而

棉花作为商品走向市场。徽州（今属安徽省黄山市）商人和山西商人大量经营棉花购销业务。山西商人在高唐北关（今实验小学处）设立了“山西会馆”办事处，常年从事棉花等商品的购销工作，江淮商贾和本地商人也争先恐后地在高唐经营棉花购销业务。明代中期以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宦官专权，赋役加重，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所谓“永不起科”也不再奏效了。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土地荒芜甚多，农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丧钟。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了北京，清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施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二十多年的抗清斗争，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作出让步。康熙帝亲政之后顺应时局，招民垦荒，放松了起科令，将原明代藩王的庄田，分别荒熟作价卖给农民，或免价给佃户耕种，把佃户改为民户，治理了河患，实行了“地丁合一税制”，改变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状况。康熙五十年（1711年），高唐州的人口达到六万六千零二十五人，比明末崇祯年间（公元1628年——1644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七百零七人，拥有耕地八千顷。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天津人龙图跃任高唐州知州，他秉皇帝旨意，缮城修志，振作诸事，棉花生产发展到令人乐观的程度。诗人邓汉议作《秋成棉市》诗曰：“秋村棉絮落纷纷，入市千堆映日曛。白比峨嵋山后雪，多于宏景领头云。用添士女三冬足，功报耕耘一岁勤。纺绩有声能不断，弦歌何必满城闻。”棉花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高唐人口猛增到十六

万六千五百四十一人，棉花的商品率也大大提高。高唐棉商奔走四方，发家致富。清道光《滕县志》记载一位高唐棉商的业迹，志曰：“吕福如世居滕西之盍（hé）村，家素贫，荷责播鼗（táo）为败竖。计乾隆元年岁杪（miǎo）。寓东昌逆旅。值一客乘健马囊橐（tuó）甚重。据上舍宿。傍晚，即束装策马急驰去。吕起触一革囊，仆提旅舍，扁户矣……。时将晡，前客趋入……曰：“失金”。问几何。曰：“挂八，为数四百。”吕曰：“无恐，金固在也……。”客乃大治肴，具结为兄弟，临别执手曰：“吾高唐人也，家业棉。兄苟有间，可过我……。”后数年，因贸易过高唐，偶探之，相见恨晚。指数楹曰：“吾欲以此置别墅，兄为我贷滕了此事乎？”吕诺之。以值易田百亩。薄其入而归焉。客曰：“兄所营者，还金者余息耳。”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高唐人种棉、业棉致富的情景。时至道光年间，高唐州的棉业成绩已相当突出。1836年高唐州志记载着“棉为州民恒产”、“货以木棉甲于齐鲁”……等语。知州徐宗干在高唐设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棉花市场——唐寺棉市。在唐寺棉市每集日的棉花贸易额达数十万觔（斤）。徐宗干作《唐寺棉市》诗抒怀，曰：“皓皓齐纨价益增，鵠（zhé）鹄（gǔ）飞罢满秋塍（chéng）。一肩黄雪输里市，万朵银花拥佛灯。巷口车声金勒马，塔前人影白头僧。当年甘碧今何在，耕织原来最上乘。”道光《高唐州志》中还载有两幅棉业画，一幅是《唐寺棉市》，一幅是棉农《采棉图》。这两幅画生动地勾画了高唐棉花丰收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正值高唐州的棉业欣欣向荣之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曾先后五次来过高唐，领略棉乡风光，挥毫泼墨，寓意地方安

康。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的主张，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推崇，“棉铁主义”推动着国家棉纺织业的兴起，植棉业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光绪十九年（公元1892年）张之洞创立湖北织布局，从美国购进优良棉种三十石，分发十五州县种植。第二年又引进美国棉种一百多石。公元1893年，东昌太守魏家华在高唐、茌平推广美棉，称本地棉亩产七、八十斤，美棉亩产二百斤上下；美棉绒长而细，色泽好，价高畅销，质地优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知州周家齐创建高唐工艺局、轧花局，仿照济南工艺局模式，采用日本产人力轧花机轧制棉花绒，将东洋人力织机改为土法工艺，织出了平白布。但这时的清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生产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受此大气候影响，高唐棉业好势头未能持续发展。直到民国中期以后才又逐渐打开棉业复兴的局面。

民国时期（1912——1949），高唐县的农业生产，仍以棉花为大宗，上田皆种棉花，所产之棉被称为特种物产，以鲁西产棉中心著称于世。但是，那个时期的棉花生产是在社会动荡不安和自然灾害不时袭来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步履艰难。民国前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势单力薄，政权脆弱，遭到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反动势力的顽强抵抗和破坏。国家四分五裂，派系纷争，地方土匪乘机而兴，生产遭破坏，民心不得安，高唐当政者象走马灯一样来去匆匆，为官者多撑邪劲，胡混一阵，谈不上“治理地方和发展经济。”可是，高唐百姓固有耕织天性，信守“民以食为天”真谛，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这片热土，致力于维持和恢复棉花生产。由于受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棉花产量低而不

稳。如民国九年春旱严重，棉花产量仅相当于民国七年的五分之一。而民国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的产量又高于民国七年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到了民国十七年时又比民国七年的产量少了许多。所以这一时期的棉花生产大体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

民国中期，棉花生产大发展。民国十八年棉花产量比民国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民国二十二年又比民国十八年增长了近一倍，民国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连年丰收，其中民国二十年创造了年产历史记录。民国二十三年，国民党中央发布废除苛杂令，本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民国二十四年，山东省第二路民团总指挥赵仁泉兼任高唐县县长，他主持制订并推行过改建新高唐施政大纲，在纲中提出“普种棉”号召，并且做了不少宣传发动和组织指导工作。如那时的歌谣曰：“劝民众，多种棉，种棉甚至可开利源，种禾利三倍，种棉利三千，每至秋收后，载棉去换钱，种棉只一亩，收洋二十元，看你种棉不种棉！”民国二十五年三月，赵仁泉移居山东第四专区公署驻地——临清县，谢锡文任高唐县县长。他继前任建设新高唐之决心，督率迈进，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召开全县村长参加的民众大会，组织发动民众落实《施政大纲》的要求。赵仁泉、谢锡文任职期间，推广“美棉”（即美国陆地棉，原产于墨西哥）成效显著。美棉又叫脱里斯棉，优良品种，高2至4尺，宝塔形，铃大中等，100——120枚得籽棉一斤，纤维长度八分之七吋至一吋，花衣28%——32%，甚早熟，适合在我县种植。1933年省实业厅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在高唐设立合作社指导事务所，派员指导工作。1934年省建设厅

派巡回团常川驻高，加强指导工作。1935年春，本县按合作办法之规定，组织成立了美棉产销合作社，省建设厅拨给脱里斯棉种十万斤，介绍中国银行贷款若干，发给县内各基层社购买肥料，加之宣传发动广泛，许多棉农奋然报名入社，（一户交两元股金）。当时，要求成立基层社的村有二百多个，因美棉种子数量有限，仅批准组织了六十六处基层社，随即选举产生了县联合社理事会，刘嘉义首任理事会主席，继之李春荣连任理事会主席三年。1935年，联合社的经营效益较好，仅轧花厂即盈利五千多元，棉农除得分红、运力收入外，每交售一百斤籽棉得返还金0.4元。广大棉农和联合社人员办社积极性进一步高涨。1936年，县美棉产销合作社扩大到153个基层社，其中一区58个村社，七区34个村社，五区24个村社，其它五个区共37个村社。社员人数3144人，植棉38737亩，得生产贷款15万元，得脱里斯棉种23万多斤，当年收籽棉148万斤，由合作社附设之轧花厂轧出花衣，运往济南转青岛华新纱厂承购，每担皮棉价格52—58元，运价（至济南）每担0.9元，加工盈利139100元，利润率约为13.8%，棉农和社方收益不少。美棉产销合作社的举办，推动了我县民间棉业的兴旺。全县优化棉种的速度加快，逐渐用美棉取代了本地棉，亩产籽棉量达到60—120斤；民间轧花户有180多家，棉花交易市场达41处，油坊五、六十家，年产油60万斤，产饼600万斤；弹花、纺线、织布者遍及城乡。与此同时，民国当局还抓了提高棉花质量工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孙科至鲁，会同省建设厅，加强棉花质量检验，设立了山东省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所，在高唐设山东省第一区分所，夏津、恩县、清平、

武城四县设查验处，属高唐分所管理，各所、处分别从事棉花质量查验工作，促进了棉花品质的提高。1934年，籽棉市价15元一担，谷子三元一担。按该年全县产籽棉四十五万担计算，产值为675万元，可购谷225万担，全县人均千斤谷！广大棉农得到实惠，不断总结种植棉花的实践经验。如农谚：“枣芽发，种棉花”，“小满种花十年九稳”，“立了秋把头揪”等。还有《高唐棉花谣》更为生动地描述了高唐棉农种、管、收、加、用棉的情形。谣曰：“棉花种，水里拌，耩到地里锄七遍。打棉花心，落棉花盘，开的花黄卧单（当时的小娘花，先开黄花后变粉红花，产量低，后来被‘大娘花’脱字棉取代），结的桃子成串串，开的娘花白藩藩。老婆拾，老头拒，担到家去箔上晒，箔上晒了筛子颤，轧车轧，响弓弹，搓的布绩长纤纤，纺的穗子圆范范，拐子拐，踅子缠，扦机好似跑开马，镶机好似拉开船。截截杼，掏掏综，拿过垫子垫上腚。脚蹬蹬，手扳扳，织布梭子两头窜，织出布来平安安。染坊染，棒槌颠，剪子剪，钢针钻，做出衣裳来可身穿。”在广大群众业棉实践基础上，本县涌现出一些关心棉业生产继续发展的仁人志士。如邑人武养志，雄心勃勃，提出了《创办鲁西实业计划》，建议鲁西各产棉县联合起来，携手兴办纺纱厂、染色厂、织布厂等，以期挽回利权，强国富民。武氏的计划，虽然由于时局的变化未能付诸实施，但是他站得高看得远，关心地方，忧国忧民，令人起敬；著名学者王静一、张修一主纂的《民国高唐县志稿》，翔实地记载了本县棉花生产情况，以期服务当时和鼓舞后人，可见其用心何其良苦。但是，好景不长，日寇1937年10月入侵高唐，1938年11月“李九”伪县长统治高唐，他

横行霸道，祸国殃民，蹂躏高唐人民达八年之久，帮助日寇在高唐掠夺了大量的棉花财富。这一时期的棉花生产面积萎缩，产量下降，群众痛苦不堪。1943年发生旱灾，食物极缺，二斤籽棉换不到一斤谷子。可是到了1944年，日寇又强迫农民每亩地交40斤棉花，市场上又出现了10斤谷子换一斤籽棉的现象。人民群众反复受折腾，倾家荡产者屡见不鲜，城东一带数十里成为无人区，被饿死者数以万计，惨状目不忍睹，难以言表。人民自有回天力。1945年日寇投降了，人民武装围歼了国民党顽杂武装，1946年高唐全境解放，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产力得到解放。1948年人民政府成立了生产推进社和供销合作社，当年收购籽棉16万担，恢复开业的民间轧户、花行949家，弹花房271户，纺织户1074家，油坊146户，加快了经济恢复步伐，为棉花生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建国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高唐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苦干实干加巧干，在发展棉花生产方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光辉业绩，书写了发展棉花生产的历史新篇章。从1949年到1993年的四十四年间，三次掀起棉花生产高潮，七次创造棉花总产新纪录。第一次棉花生产高潮出现在1955年——1958年，皮棉总产量分别是18.99万担、24.834万担、24.684万担和23.492万担，连年高产；第二次棉花生产高潮，发生在1964年和1965年，皮棉总产量分别是17.52万担和19.59万担，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第三次棉花生产高潮，贯穿在八十年代始终，那十年，是高唐县棉花生产的鼎盛时期，是最辉煌的年代，其中有五个年头创造了皮棉总产量最

高历史纪录（产量数字后叙）。这三次棉花生产高潮的出现和七次创造历史年产最高纪录，是有着历史性渊源的，并非偶然之事。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狠抓了经济恢复工作，号召全国人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上级对棉区采取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高唐发挥棉花生产优势，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广大农民坚定了“要发家种棉花”信念，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多种棉、种好棉，棉花生产形势逐步呈现出喜人景象。1949年国家规定每斤净棉顶交秋征粮15斤和1斤籽棉换2斤至3斤13两小米政策，全县植棉28.5万亩，总产皮棉7.98万担，县供销合作社收购10万担籽棉，组织棉业改进社加工厂、公裕轧花厂和民间轧户进行棉花加工，县花纱布公司也积极进行收购和运销工作。同年11月，高唐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扩大植棉面积”的决议，大力倡导发展棉花生产。1950年，县供销合作社引进斯字棉种80万斤，从天津、济南等地购进信石（砒霜）2167斤、硫磺及杀虫药粉3200斤，供应棉农。全县植棉28.1万亩，收获皮棉9.25万担。1951年我县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和售棉竞赛活动，植棉38.6万亩，县供销合作社从济南、洛口等地换购豆饼248万斤，结合银行贷款发给棉农，该年总产皮棉9.5万担，全县设49处棉站，收储皮棉67400担，及时支援了国家纺织工业的生产急需。1952年，植棉36万亩，总产皮棉12.8万担，县供销合作社统管棉花收购和加工业务，与棉农、互助组签定预购合同9031份，发放预付定金54.7万元，供应棉农布匹、煤、大米、肥料等折款53.4万元，建立了第一棉花加工厂，将棉花改进社加工厂改为第二棉花加工厂，成立了棉花经理部，加强了棉花加工

和经销工作。1953年，国家推行计划种植棉花政策，按种植棉花面积供应物资和发放定金，全县植棉32.5万亩，因灾减产，总产皮棉7.97万担。1954年植棉41.2万亩，总产皮棉13.72万担，是年国家全部关闭了棉花自由市场，加强了统一收购和加工工作。上级决定将建国后高唐第一家棉花加工企业公裕轧花厂并入县供销合作社，成立第三棉花加工厂。1955年国家对超购部分实行“每百斤皮棉奖售粮食15斤”的政策，全县植棉45.4万亩，总产皮棉18.99万担，首创建国后年产最高纪录，同年在尹集镇成立了第四棉花加工厂。1956年政府为棉农供应岱字15号棉种680万斤，农药福尔马林2831斤，其它农药549800斤，推广了新农药“1605”和“1059”，推行了农药拌种，改制了药械喷雾器，强化了优惠政策（棉农每预售一担皮棉，除按粮食和棉布统销规定兑现以外，增加供应粮食10斤和布票10尺，并供应50—100斤饼肥）。是年，全县植棉48.8万亩，总产皮棉24.833万担，又一次创年产最高纪录。1957年国家号召稳定棉花种植面积，强调提高棉花质量。全县植棉49.9万亩，县供销合作社与全县11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签定了预购合同，发放定金217.5万元。棉农每出售一担皮棉，在计划供应外优惠供应棉布5尺。县第二、三、四棉花加工厂合并组建了“店子二厂”。为了提高棉花质量，推广了棉花分拾、分晒、分存、分卖的“四分”作法，受到省供销社通报表扬。当年，全县收皮棉24.683万担，接近历史年产量最高纪录。由于我县棉花连年获得高产，工作成绩显著，中央和省地领导多次来我县指导工作，许多外地同志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我县植棉能手、全国劳动模范魏振卿和杨朝荣、常凤武

等应邀赴烟台、牟平、诸城、高密、五莲、荷泽、巨野及河北沧州、河间等地作先进事迹报告，介绍植棉经验。1957年和1959年中央两次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魏振卿代表高唐棉农在会上发了言，并操作示范，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称赞和与会代表的欢迎。1958年，全县人民进一步鼓足干劲，在棉花生产方面采取许多新举措，再创辉煌，得到国家支持帮助，国务院农业部和中国民航总局在我县张八里村东建成简易飞机场，调国产“安二型”飞机对我县21.5万亩棉田喷洒农药，防治棉花虫害。这一年棉花长势很好。7月18日，刘少奇委员长亲临姜店宏伟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棉田，同棉农亲切交谈，鼓舞着全县干部群众争取更大胜利。但是，从下半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刮起了“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上的瞎指挥风）。秋后，尽管满地棉花白花花，但无人摘拾，造成丰产不丰收的结局。大跃进运动的持续和发展，使我县各项工作急转直下，1959年和1960年棉花生产一再滑波。俗话说祸不单行。1961年春夏大旱，自上年10月至是年6月28日，仅降雨70毫米，31万亩农田受灾，群众生活困难，水肿病患者增多。这一年“盲流”巨增，人口比1957年减少20898人，全县仅收购皮棉130担。1962年，秋涝、霜冻早临，全县皮棉产量不足万担，幸而夏粮丰收，群众生活有所好转。但是总的说1960年至1962年是建国以来棉花产量最低的三年。1963年，我县认真贯彻了国家的“调整”政策，大力恢复棉花生产，皮棉产量有所回升，达到10.1383万担。1964年回升速度继续加快，全县植棉52.074万亩，发放定金271万元，供应化肥4776吨，农药998吨，药械5544架，建立